



顺泸起义

匡珊吉 郭全 刘邦成 著
● 四川大学出版社

34

順 泸 起 义

匡 珊 吉

郭 全

刘 邦 成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建明

封面设计：李 玫

顺 泸 起 义

匡珊吉 郭 全 刘邦斌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航空工业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31 字数129千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ISBN 7—5614—0097—7/K·13 定价：1.52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顺泸起义前夕四川的政治形势	(6)
一、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	(7)
二、中共重庆地委的建立	(14)
三、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形成和革命运动 的发展	(18)
四、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37)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川军各部中的工作	(41)
一、中共重庆地委对组织川军起义的最早 设想	(42)
二、对川军的初步调查和策反	(44)
三、深入开展四川军事运动	(55)
四、发动武装起义前夕的准备	(72)
第三章 顺泸起义的爆发	(84)
一、泸州起义	(85)
二、顺庆起义	(93)

三、四川各阶层群众对起义军的拥护·····	(99)
第四章 四川军阀围攻顺庆和川军“易帜” ·····	(105)
一、刘伯承督师顺庆·····	(106)
二、罗泽洲等围攻顺庆·····	(111)
三、顺庆起义军撤退开江·····	(120)
四、武汉政府对顺泸起义军的支持·····	(126)
五、四川军阀的“易帜”·····	(132)
第五章 开江和万县的斗争 ·····	(136)
一、顺庆起义军在开江·····	(136)
二、杨森在顺泸起义中的表现·····	(140)
三、在万县召开的军委会·····	(145)
第六章 激战前的泸州 ·····	(150)
一、起义初期的泸州·····	(150)
二、刘伯承整顿泸州军政·····	(158)
第七章 坚守泸城四十一天 ·····	(169)
一、右派活动的猖獗与“三三一”惨案·····	(170)
二、坚守泸城的战斗·····	(178)
三、泸州起义军的失败·····	(189)
后 记 ·····	(198)

绪 论

中国共产党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于1926 12月初，组织领导了震撼全川的顺泸起义。这次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国共两党合作，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起义。这次起义分别在顺庆（今南充）、泸州两地发动，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一、二、三、四、五路，由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任司令。后又组建了第六路，由皮光泽任司令。各路兵力总计一万二千余人，由刘伯承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指挥。1927年5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这次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开始，到1927年5月23日泸州突围，坚持了近半年之久。由于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加之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在军阀刘湘等反革命围攻下，起义最终失败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6年底到1927年初，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大买办阶级、封建军阀的勾结日益紧密，其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和公开化。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流血事件，直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在这个反革

命逆流袭来、革命处在日趋危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联合四川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动了顺泸起义。因此，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挽救革命、回击蒋介石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顺泸起义的爆发，从反动军阀营垒中杀出了一支革命的军队，给了四川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川军中一些倾向革命的师长、旅长，纷纷发出电报向起义军祝贺，有的自动易帜，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北伐；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四川军阀头目改弦更张，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这种形势使军阀头目们感到，如果坚持站在北洋军阀一边与北伐军为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将危及自己的统治，其部属将会自由行动而无法控制。因此，顺泸起义爆发后，四川各派军阀头目，除刘存厚仍旧死抱住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不变外，都纷纷请求国民政府给予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投机易帜。另一方面，刘湘等军阀头目，视刘伯承所领导的顺泸起义军“为心腹之患，若不消灭，亦寝馈不安”。^①基于上述原因，拥有二十万大军的军阀头目们，不得不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加强对自己部属的控制和扑灭起义军，暂时无力派兵东下援助吴佩孚、孙传芳，从而解除了北伐军所受到的侧翼威胁。所以，顺泸起义对保卫武汉革命政权，配合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之主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顺泸起义显示了革命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6月，四川各地乡镇农民协会，比1926年6月增加了五

^①《民力日报》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倍以上，农民协会会员增至三万三千多人。在武装斗争高潮的1927年春，四川约有农民武装三万多人。李蔚如领导的涪陵农民自卫军与军阀、团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涪陵被誉为大革命时期“川东革命堡垒”。余宏文在宜宾观音乡领导农民武装进行反军阀、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打跑了反动军队。蒲江高桥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捐抗粮斗争，吓得县知事携印逃往邛崃，高桥成了农民的天下。“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军阀派兵一营进攻高桥遭到惨败，增兵再攻，又被农军击败。农民自卫军万余人，乘胜围攻县城。军阀再次增兵，农军退往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到1929年。郫县农民自卫军在刘愿安策动下进行的抗捐抗税武装斗争，在临近各县农民武装万余人的支援下，围困郫县长达一月之久等等。另外，四川军阀头目的易帜，虽有很大投机性，但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在四川从事军运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通过莲花池党部，中国共产党向川中各军派入了一批政治工作人员，他们在军队中宣传革命理论，启发官兵觉悟，在官兵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组织，在反动军阀队伍中播下了革命种子。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民中、军队中播下的革命种子，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出了鲜艳的革命花朵。这个时期，四川爆发的六十多次农民暴动和军队起义，即是其具体体现。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底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底优点之一”①。对于中国

①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1页。

革命的这个特点和优点，我们党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开始我们党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到了创建黄埔军校，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统一广东的战争，我们党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叶挺领导的独立团，这个团在北伐战争中成为闻名全国的“铁军”。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我们党又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四川的顺泸起义。这两次起义表明我们党对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虽然这个问题的彻底认识是在南昌起义之后，但它是与我们党以上一系列革命实践分不开的。顺泸起义就是这些伟大实践之一。参加过顺泸起义的领导人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在顺泸起义失败之后，即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一起领导了震撼世界的南昌起义。顺泸起义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党发动南昌起义，以及后来建立人民军队，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战争，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在此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近来有的同志在论著中，称此次起义为“泸顺起义”，其主要理由是泸州起义的时间在先，坚持时间长，影响大。我们认为，还是称“顺泸起义”为好。理由如下：一、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决定的起义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两个旅和江防军第二区部队首先发动起义，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泸州起义部队开赴顺庆会合，编为一个军，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住脚跟。再视形势发展，或进军川陕边，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西北国民军会合。按此计划，称为顺泸起义较为切当。后来，因敌情变化，泸州、顺庆均被迫提前发动；五路会师之未能实现，非

计划之改变，而是泸州起义将领陈兰亭、皮光泽不愿撤出泸州所造成，致使顺庆起义军孤立无援，泸州起义军坐困孤城，陷入严重困境。二、在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并具体指导起义的吴玉章，回忆此事称为“顺泸起义”；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副指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副军长黄慕颜，亦称此次起义为“顺泸起义”。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均系此次起义的领导人，一致作如此称呼，我们应予尊重。三、以往大量回忆录、论文，均称此次起义为“顺泸起义”。它实际上已成为历史上特定的专有名词，我们不宜轻率地加以改变。因此，本书仍以《顺泸起义》为名。

第一章 顺泸起义前夕四川 的政治形势

顺泸起义前夕的四川，是由若干大小军阀分裂割据着。他们经常进行争夺地盘的混战，并在各自“防区”内，拥兵称王，横征暴敛，为所欲为，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都是挂着“五色旗”的北洋军阀的附庸，反革命阵线的组成部分。北伐战争开始后，在吴佩孚的策动下，他们中有的人准备派兵东下援吴，侧击北伐军，乘机扩展自己的势力。北伐军势如破竹的声威，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四川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震慑了四川各派军阀，使他们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于是，一方面打起“保境安民”、“地方自治”的旗号伪装中立，甚至派遣代表向国民政府“输诚”；另一方面与吴佩孚信使往来，并派有代表与蒋介石勾结。

中共重庆地委建立后，与国民党在四川的左派人士密切合作，建立了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此时四川人民在军阀残酷的压迫下，已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在北伐胜利形势推动下，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妇女等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逐步把革命运动

推向了高潮。

一方面，革命已经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众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已有所提高，人民群众已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但是，革命主观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军阀虽然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但军事势力强大，并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力量对比占有较大的优势。这就是当时四川政治形势的显著特点。

一、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

省内若干大小军阀长期割据一方与战乱连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四川的军阀，大者据有数十县，小者据有数县。他们在所割据的区域内，自委官吏，自征赋税，拥有封建君主般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自1924年熊克武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败退出川之后，四川军阀刘湘、杨森、刘存厚、刘成勋、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等，统统投靠了北洋军阀，分别接受了北洋军阀所委任的督办、帮办、省长、总司令、屯垦使之类的职务，而成为了反革命的一翼。但是，他们又不是北洋军阀的嫡系，对北洋军阀保持有很大的独立性。北洋军阀此时已分裂为直、皖两系，他们亦因其内部的矛盾而依违于直、皖两系之间。他们之间，你想吃掉我，我想吞并你，频繁地进行着争夺地盘的混战。为了争霸的胜利，他们不断地、无限制地扩充军队，使四川军队之多，甲于全国。为了保证军费之需和敛财自肥，他们不断地、无限制地增捐加税，使四川捐税之重，冠于全国。

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四川军阀已拥有一支庞大的反革

命军队。1925年杨森发动“统一战争”失败以后，12月，在成都召开了善后会议，各军所报枪支共计198500支。其中川康边务督办、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刘湘有枪56000支，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有枪38000支，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刘文辉有枪21000支，西康屯垦使赖心辉有枪21000支，四川西北屯殖总司令田颂尧有枪16000支，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有枪6000支，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有枪5000支。此后，经过驱逐袁祖铭之战，杨森势力再起，有人枪70000。到1926年底，四川各派军阀总兵力达20余万人。

1925年8月24日，杨森发动的“统一战争”失败已成定局，在刘湘主持下，反杨各军在自流井召开了分驻会议，其防区划分如下：

邓锡侯驻地：金堂、广汉、彭县、什邡、郫县、灌县、新都、新繁、遂宁、安岳、乐至、合川、武胜县等。

刘成勋驻地：邛崃、大邑、蒲江、双流、新津、温江、崇庆、彭山、丹陵、雅六属和宁属。①

赖心辉驻地：富顺、泸州、成都、华阳、简阳、江安县等。

刘文辉驻地：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嘉定等。

田颂尧驻地：安县、绵阳、绵竹、罗江、德阳、梓潼、阆中、苍溪、巴中、南江、通江、仪陇、三台、中江、龙四属。②

① 雅六属：雅安、名山、荣经、芦山、天全、清溪。宁属：西昌、冕宁、盐源、会理、越嶲。

② 龙四属：平武、江油、彰明、石泉。

何光烈驻地为：南充、西充、蓬溪、蓬安、南部、射洪、营山等县。

刘存厚驻地为：达县、宣汉、万源、城口、渠县、开江等县。

刘湘驻地为：巫山、奉节、云阳、开县、万县、巫溪、梁山、忠县、石柱、丰都、垫江、大竹、邻水、岳池、铜梁、大足、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等县。

黔军袁祖铭据有：綦江、南川、黔江、彭水、酉阳、秀山等县。

1926年上半年，杨森返川，刘湘、杨森等联合驱逐袁祖铭回黔，川军各部割据情况及其兵力均有所变化，兹就变化情况，略述如下：

杨森在“统一战争”失败后，被改编之郭汝栋等六部归复杨森后，杨森有人枪七万之众，重庆以下（不含重庆），下川东各县为杨森所据有。

刘湘原下川东防地归杨森所有。原有重庆以西（含重庆）迄至资中防地不变。从黔军手中夺取了綦江、南川、黔江、彭水、酉阳、秀山等县。

刘文辉除原有防地外，略取了叙南六属：高县、珙县、筠连、庆符、长宁、兴文。

此外，1926年5月2日，邓锡侯、田颂尧在成都将赖心辉软禁，逼其交出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印信，由邓锡侯部李家钰接任，赖心辉驻成都的部队被武力改编，从此，成都形成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部合驻的局面。赖心辉从禁中逃出后，失去了成都、简阳、华阳，仍据有泸州、纳溪、江安等县。其他各部防区，没有多大变动。

北伐战争开始时，全川共有陆军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混成旅。其他已受编制称司令、称总领、称警卫旅等直辖于督办、总司令和省长等又二十余部。其人枪不足一旅，尚未编制就绪，而称补充旅、独立旅及某支队者无法统计。按《民视日报》1926年夏所载《四川军队调查表》撮举其要如下：

督办军务刘湘所部十师（师长唐式遵、罗炜、何光烈、王陵基、王缙绪、潘文华、兰文彬、鲜英、张邦本、朱宗懋），师各二旅；三混成旅（许绍宗、穆瀛洲、杨吉辉）。

讨贼联军川军总司令杨森所部十六师（师长曾述孔、李雅材、王正钧、杨淑身、向成杰、魏楷、王文俊、杨国桢、郭汝栋、何金鳌、吴行光、白驹、范绍曾、杨春芳、唐维源、杨自兼一师），师各二旅。二总司令（罗觀光、龚达），一宪兵司令（于渊），四混成旅（喻孟祥、李御良、包晓南、李蓬春），一警卫旅（范毅），一将校队（杨干材）。

清乡督办邓锡侯所部直辖四师（陈鼎勋、马育智、罗泽洲、邓自兼一师），三混成旅（刁世杰、陈光藻、朱英）。外辖江防军总司令黄隐，副司令甘泽霖，与其所属的一师（邓国璋），①二独立旅（魏孝宽、刘莅水），三区司令（许渭滨、黄慕颜、罗乃璠）。又辖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及其所属的二师（陈能芬和李自兼的一师），六混成旅（廖家孝、邓和、邓观群、余敬、饶泽韬、张遂良）。

帮办军务刘文辉所部四师（费东明、夏首勋、冷熏南、刘自兼一师），四混成旅（陈献周、林云根、张清平、唐英），

① 据192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四川军事调查》载，江防军无副司令，无师级编制，三旅长为邓国璋、甘泽霖、刘莅冰（水）。

一警备旅(覃小楼)。

川西北屯殖总司令田颂尧所部四师(孙震、王铭章、田自兼二师①)，二混成旅(罗乃琼、曾宪栋)，一汉军统领(吴畅)。

四川省长赖心辉所部一师(李宏琨)，四混成旅(范世杰、李章甫、魏泽民、袁品文)。②

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部二师(皆刘自兼)，五混成旅(刘国孝、孙涵、羊清泉、贺中强、苏普洲)。

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所部三路司令(魏邦文、余光武、郑西屏)，一混成旅(申介屏)。

另外，就我们所知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名义上虽隶属刘湘，实际上独自成系，辖三旅(秦汉三、杜伯乾、胡伟)。

战争的频繁，军队的扩大，军费也急剧膨胀。四川历年军费开支情况如下：

民国元年	(1912年)	6100000元
民国二年	(1913年)	9900000元
民国三年	(1914年)	7800000元
民国四年	(1915年)	8900000元
民国五年	(1916年)	8000000元
民国六年	(1917年)	8400000元
民国七年	(1918年)	14007000元
民国八年	(1919年)	14340000元

① 《四川军事调查》载，田自兼者一师，即国军第二十二师。

② 赖心辉部为五个混成旅，另一旅旅长为陈兰亭。

民国九年	(1920年)	10390000元
民国十三年	(1924年)	30019654元
民国十四年	(1925年)	38803853元①
民国十五年	(1926年)	35834672元②

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五年，十五年间，四川的军费开支，扩大了五、六倍。为了攫取如此浩大的军费，以及满足军阀及其爪牙敛财自肥的贪欲，军阀向人民榨取的钱财，也飞速增长。这种增长反映在四川财政收入发展上。民国五年（1916年）四川财政收入为1400万元，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发展到5800万元。如此庞大的收入是怎样得来的呢？答案只有一个，即增捐加税。

四川军阀增捐加税，名目繁多，数量沉重，手段残酷。仅举田赋预征，以窥一斑。中国历代田赋，一般是每年征收一次。开初军阀们为了某种需要，实行“借垫”，将所需之款项，按田亩之多寡进行摊派，规定以次年粮税作抵；或由豪绅地主“垫款”，允他们在代征田赋时扣还，并给以“九五回扣”。这种“借垫”的款项，初犹偿还，后来借而不还，干脆实行预征了。所谓预征，就是军阀政府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赋提前征取。

四川田赋预征最早始于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十五日，钟体道在绵阳预征民国八年（1919年）正附税，普遍实行则在民国十二年，逐步发展，愈来愈重。举例如下：

① 《民间意识》第14至16期，民国二十三年八月。

② 善后会议预算，各军并不受此约束，实际大大超过此数。